



重建后的德国国会大厦

血缘不等于国籍

——当今德国的移民问题

文 / 王才勇

提起德国,谁都会想到,德国是个历史上比较排外的民族,怎么会还有移民?其实,当今世界,每个得到迅速发展的民族都多多少少地有一个外来移民涌入的过程,德国也不例外。

新移民以苏东为主

二次大战结束后,出于重振经济的需要,当时西德困于战后一般劳动力的缺乏,曾从国外,主要是土耳其输入大量劳工。在1955年到1973年战后西德的经济腾飞时期,有一千四百多万以土耳其人为主的外国劳工被输入到西德。当时的东德在其经济建设时期,也曾从远在欧洲的越南引入了大量一般劳工。这些外来劳工对战后德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起了不容置疑的作用。如今,德国许多大城市的地铁公路等基础设施都是当年这些外来劳工建成的。这一代移民是当时德国政府“请”去的,他们中大多数人本身也是怀着到富国去创造新生活的愿望而自觉来到德国的。因此,他们中的很多人今天已在德国扎下了根,有了第三代、第四代子孙。

当今德国新移民中很少为外人所知的是八十年代末,尤其是苏东解体后从原苏东地区大量涌入的族群。据德国官

方统计,在从1991年到1998年的时间段里,共有八百八十万入主要从原苏东地区移居到德国。这些人主要以两种方式进入德国:其一,作为难民。苏东解体,尤其是南斯拉夫内战,导致数百万人以难民身份涌入当时西欧经济最发达的德国,而德国基于自身宪法的有关条款又不得不接纳这些难民;其二,作为侨民。早在八十年代末,当时西德的科尔政府已通过一项法令,允许历史上自中世纪始直至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移居到原苏东地区的德国侨民返回到德国定居。苏东解体前还没有多少人以这种方式返回到德国,苏东解体后,这些人开始大量涌入。

德国人的态度

九十年代,随着两德的统一,德国经济经历三十多年的持续增长后,开始放慢脚步,失业率开始升高。这些移民的大量进入引起了社会的一些紧张气氛,即一些生活受到冲击的德国人对这些外来移民表现出不满,因为德国政府不仅向这些新移民大量颁发了居留证和工作许可,而且还给予了数量不等的每月生活补贴,比如一个被批准的难民每月可获得约800马克的生活费,而且还可以无偿

地在难民营居住。这使得每月老老实实地纳税的德国人对这些不劳而获的新移民怒目相视,尤其是那些在九十年代失业的德国人,更是迁怒于这些新移民,而且还由此引发了对自身政府做法的不满。

就这些新移民群中的难民而言,德国社会上除了少数人(其中大部分又是两德统一以来生活不太景气者)对之以各种方式宣泄心中的不满情绪之外,出于对自己国家难民政策的理解,并没有表现出什么不快。加之这些难民本身是怀着求生的希望来到德国的,因而在社会上大多以谦逊恭让的方式与德国人相处,这也就缓解了一些社会上因之而来的紧张气氛。

而那些重返故土的德国侨民的情形就截然不同了。首先,德国政府对这些人



德国街头

采取了政策上的明显倾斜,以引发更多的这类外国侨民回归故里。本来,这一点是无可厚非的,但由于较之于难民,德国政府采取了倾斜政策,而且这些侨民具体所指的又是那些数十年或数百年前移居到原苏东地区的德裔人,其中几乎所有人已不再会说德语,他们除了留有一个德裔家族的姓名外,几乎已不再有任何德裔文化的痕迹。正是对这些



移民问题已成为德国各界关注的热点

早已被当地文化同化了的德裔侨民,德国政府制定了倾斜政策,比如为他们提供了远比难民营好得多的生活补贴,此外还为他们在德国接受语言和职业再教育准备了大量奖学金;其次,就这些侨民本身而言,由于他们早已被所迁德国同化,所以,在八十年代德国这项政策刚出台伊始,这些侨民的反应并不热烈,只是到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由于原苏东国家本身开始解体,这些历史上的德裔侨民才开始考虑利用这项政策移居到生活条件明显好得多的德国。

移民的心态

因而,九十年代以来大量涌入德国的这些历史侨民在心理状态上与那些难民完全不同。这些侨民一来到德国马上就可以获得德国身份,但他们既不会说德语,又由于初来乍到而对德国社会一无所知,由此形成了一种对德国政府不感恩(是你们政府要我们回来的),在社会上不积极去同化(我们有自身的文化)的心态。这种心态显然加剧了这些历史侨民与德国社会的隔阂。

这些侨民,一方面不太愿意去学德语,因为在他们心目中,来到德国是德国政府所需,所以用不着再去花很大劲学德语,德国政府应养着他们。事实上,德国政府已给予了他们每个人足够的维持日常生活基本开支的补贴。这样,这些人在德国就不太愿与德国人混居,而只说自己原有的语言,展示自己原有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不可避免地引起德国社会对这批人的不解以及由不解而来的不

恭。辛辛苦苦成年纳税的德国人自己要获得一份生活补贴,是何其难;而这些外来的德国人未交过一分税,却轻而易举地获得了他们纳税人的钱,且又没有明显的表示谢意的归属举止,这就很难使德国社会对他们表现出认同。

这同时使得这些历史侨民在德国的新生活无法感到舒适,尤其是其中的年轻人,来到德国之后,失去了原有的朋友,在德国全新的生活方式中难以结交新朋友,加之由于不适应随之而来的就业压力,更使他们看不到来到德国的意义。这就使得他们对随父母来到德国而开始的新生活采取消极应付态度,比如学业不求上进,一味沉溺于眼下即时的享受。

以务实的态度对待移民问题

这些历史侨民重返德国的生活状况是当今德国上下尽人皆知的。其间的问题自然引起了不少人对一味以血缘定国籍的老做法进行重新审视。不论就哪种移民族群来说,移民本来不是为了增强内聚力,就是为了增强综合国力。九十年代以来涌入德国的这些新移民,一方面成了政府的一大笔额外开支,另一方面又没有很好地达到以上任何目的,因为这些移民并非德国目前所需劳工,而且在同化这些移民方面所引起的社会对立又威胁着国家内聚力的增长,这就迫使有关部门对以血缘定国籍的一贯做法进行某些修正。

在地缘政治学和工业开发时代,以血缘定国籍的移民政策确实起到了一定

的吸引劳动力和增强内聚力的作用。而在社会越来越走向需要大量专业人才的今天,以血缘定国籍的传统做法自然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德国九十年代涌入的新移民就以事实表明了这种传统做法的不合时宜。有鉴于此,九十年代末以来,尤其是2000年,移民问题成了德国各大媒体报道和讨论从未有过的热点,这些报道和讨论的焦点是如何放宽或突破以血缘定国籍的传统做法,以使德国确实需要的人能移居到德国来。这直接导致了德国现政府2000年出台了一系列对此前移民政策的修改,比如凡在德国出生的任何人都能自动获得德国国籍,以前外国人在德国交满15年税方能入籍,现在只需8年等等。这些变动中最具创新和现代精神的是允许德国目前紧缺的IT(信息技术)专门人才,从世界各地直接来德国工作和定居。这一政策一出台,很快在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在第三世界国家引起了IT专门人才的竞相申请。

由于移民政策的松动变化,使德国这样一个以血缘定国籍根深蒂固的国家向移民政策的现代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美国经常看见的不同人种在同一单位共事的情形,在当今德国,尤其在科研和经济领域,已开始渐渐出现,比如在德国耶那新近成立的马克斯·普朗克化学生态学研究所的七位科研人员中仅有一名德国人,其余六位分别来自美国和欧洲各国。

另外,当今德国社会上的异国婚姻也越来越多。

在现今这个人才竞争越来越全球化的时代,像德国这样在移民问题上向来保守的国家也不得不开始走向开放,正像美国《华尔街通讯》杂志资深编辑G. Pascal Zachary在其著名的新作《The Global Me》中论述的一样:在生育力越来越低,人口越来越老龄化的西方国家,当今不引入新移民,已无法得到进一步发展。而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为了应对西方国家早已启动的新移民政策,是否也应考虑一下怎么留住人才,怎么将人才流失降低到最低限度?